

苏联经济发展史简论与启示： 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

陆南泉

【摘要】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赫鲁晓夫先后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这40年中，苏联在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斯大林时期，苏联大力推行工业化，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经历了卫国战争，战后又开展经济恢复工作，在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经济结构畸形、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固化、农业严重落后等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政治上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经济上一方面着力解决农业问题，另一方面力图通过大改组推动工业加速发展。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由于经济政策上的严重失误，苏联经济呈恶化趋势并出现了混乱局面，这是导致他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斯大林；赫鲁晓夫；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计划经济体制

【作者简介】陆南泉，男，江苏江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北京100732）。

【原文出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沪），2022.5.120～136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掌权，直至1964年因政变下台。在这40年中，苏联在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涉及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斯大林时期的经济

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有所恢复，但经济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仍然是旧俄国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技术结构。首先，苏联仍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落后的农业国。1926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1%，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6%，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其次，虽然1925年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战前的73%，但机器制造、冶金、燃料、航空、电力和建筑材料等主要工业部门很不发达。实际上，到1925年苏联还没有汽车、拖拉机和航空等重要工业部门。第三，工业设备如机器与机床基本上是旧式的，而且多半磨损严重，同时苏联没有能力

生产现代化设备，很多机器设备要靠进口解决。1927年苏联的机器设备进口额比1924年增加1.3倍，其中金属加工设备进口额增加3.9倍，动力设备进口额增加5倍。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的独立性。第四，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运输业恢复较慢，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面对经济落后的状况，斯大林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一方面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努力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准备推行工业化，实施五年计划。在经济基本恢复的基础上，从1929到1941年，苏联实行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

（一）大力推行工业化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因此，联共（布）十分重视发展工业，希望使苏联尽快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斯大林在大会上强调：“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

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的基础”。^{[1]293,294}

这次大会提出了工业化方针,但并不意味着工业化时期由此开始。因为工业化并不是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会上也没有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政策、纲领和任务。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标志。^①至于工业化运动何时结束,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②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来讲,主要是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的。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用4年完成的,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1941年被德国入侵苏联的战争打断,这样,工业化运动大体持续了13年。

斯大林时期工业化运动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投入,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苏联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将工业产值年均增速定为14%。其次,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斯大林一再强调,苏联不能走“‘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要“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2]496}与此同时,斯大林指责布哈林等人,称“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工业化道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一五”计划期间,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占32%。在整个工业化时期,这一比重均在30%左右,有时甚至达40%。在整个工业投资中,重工业的占比更高,“一五”计划期间高达86%。再次,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一五”计划末的1932年,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资金占到了27%。在整个工业化时期,这一比例一直在30%左右。为了实现高速工业化和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还实行榨取农民、靠农民“贡税”来积累资金的措施。斯大林用强制手段,迫使农民将一半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

期间,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的资金的1/3以上。

从工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角度来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成功。对此,苏联后来的历届领导人都持肯定态度。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时期苏联正是由于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变成强大的工业—集体农业的强国”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堡垒”。^{[3]18-20}勃列日涅夫在评价实行工业化的三个五年计划时说:“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岁月离开得越远,这段困难的然而也是光荣的时间在我们面前也就显得越加宏伟”,“我们头几个五年计划是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战斗”。^{[4]182-183}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不行的。法西斯的威胁从1933年起就开始迅速增长。”“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5]41}长期以来,多数苏联学者对工业化运动的评价与官方是一致的。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推动了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大提高了工业实力。“二五”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值从欧洲第四位跃升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17年的3%提高到10%。按斯大林的说法,“三五”计划结束时,苏联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

第二,基本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独立性大大增强。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很多重要工业部门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机器制造业处于特殊的优先发展地位,1940年苏联全国的机床总数达到了71万台。这就使苏联工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二战前,苏联能够依靠国产机器设备满足国内大部分需要,特别是能保证军用生产部门的需要。

第三,带动了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要发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不仅要投入大量资金,

还必须以大量资源为支撑。苏联东部地区(西伯利亚与远东)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资源。推动工业化,加速了东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1940年东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仅次于南部地区,居全国第二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亦高于全国的工业增长速度。194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11倍,而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分别增长了13倍和28倍。

第四,增强了国家军事实力,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创造了物质条件。大力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是斯大林一直坚持的战略思想。可以说,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大力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工业化运动期间,苏联军事工业的核心是由一些骨干军工企业组成的。1928年这类企业只有46家,到1938年已经增加到200家。苏联军工生产能力发展十分迅速,军工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而这正是苏联最终战胜德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带动了教育与科技的进步。推动工业化,必然要以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支撑,而教育和科技的进步又会反过来促进工业生产的现代化。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苏联劳动者的扫盲工作已基本完成,9-49岁的居民识字率达87.4%。学校教育内容不断改进,在校学生数持续增加。1938-1940年,共有32.8万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67.8万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战争前夕,苏联高等学校在编人员有5万人,从事教学活动的有5300名教授、13100名副教授、31600名助教与其他教师。1940年底,全国共计有2359个科研机构,98315名科研人员。苏联在量子力学、空气流体力学、微分方程、复变函数、数论、概率论等理论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技术科学和具体应用研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步,如电气机械制造、机床制造、化学机器与重型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均研制出新型产品。化学工业方面的成绩更为明显,1940年苏联在重要化学产品方面已实现完全自给。^③

第六,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1927-1940年,苏联平均每年建成8座城市。城市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是1941-1945年,平均每年建成9-10座新城市。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亦迅速增长。1926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7.9%。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许多村庄变成了城市或市镇,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迅猛增长。1927-1938年,城市人口每年增加240万,到1939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苏联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肯定斯大林工业化政策的观点已不多见,更多的是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严重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战前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包藏着深刻矛盾,积累了大量尖锐问题。苏联学者卡普斯京指出:“从历史上看,不惜任何代价的超工业化策略是否站得住脚呢?是否还有别的、非斯大林的实现工业化选择?选择是有的,存在过!”他认为,这种选择就是列宁提出的建立工业与农业正常经济联系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因1929年秋天斯大林突然提出“大转变”而停止了,苏联转向了“迅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④苏联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2年指出:“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一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斯大林“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和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6][182,172]}麦德维杰夫对斯大林在工业化运动中所起作用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征收“贡税”榨取农民,对农业造成极大破坏,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与平衡发展。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断增加农畜产品征购量,同时不断压低农畜产品收购价格。为了保证高速工业化所需资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仅形成了,并且不

断扩大。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其成本低得多的情况长期没有改变。下面的材料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粮食价格是成本的13.2%，马铃薯价格是成本的7.5%，牛肉价格是成本的5%。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卖给国家99吨小麦就能买一辆“吉斯-5”汽车，1948年则要卖出124吨小麦，到1949年就必须卖出238吨小麦。对此，戈尔巴乔夫说：“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7]35-36}

第二，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而农业长期落后，也制约了轻工业的发展。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如果1928年苏联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为100，那么1932-1933年只有53，1936年只有60。从1928年到1938年，苏联农民的人均收入降低约20%。^⑤居民住房条件长期未得到改善。1913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7平方米，1928年降至5.8平方米，1932年为4.9平方米，1940年为4.5平方米。由于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经济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市场供应紧张，排队抢购商品是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常见图景。

第三，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苏联重工业高速发展，依靠的是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这种粗放型工业生产，必然造成资源浪费大且经济效益低。工业化运动期间虽有大量企业投产，但经济效益长期上不来。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到1935年才有第一家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成为盈利企业。1950年，苏联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30%。

从经济管理体制角度来看，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对苏联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实践表明，这种体制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的。

(二)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

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落后的农业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

业，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一个中心问题。不论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斯大林时期，农民和农业问题都是苏联党内各派斗争的焦点。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农民和农业问题更加突出，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与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8]539}然而，农业集体化“这个原来就是异常复杂的关键性转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6]141}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农村的形势出现明显好转。1926年苏联农业总产值达到1913年水平的118%，其中种植业产值为114%，畜牧业产值为127%。^{[9]412}农业的恢复，与受农民欢迎的、主要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有关。在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前夕，农业合作社联合了全国5570以上的农户。这些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为简单，主要局限于消费与流通领域，但它符合当时苏联生产力水平低和人民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具有重大意义。^{[8]768}这种合作社遵循自愿参加和退出的原则，是按商品生产规律与市场规律进行活动的。如果继续坚持发展合作社，并按照列宁的合作制思想不断修正与完善政策，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的康庄大道。应该说，1928年之前斯大林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总体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肯定的。他曾说：“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这些共同利益就是工农联盟的基础”。^{[10]372,336}但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及采取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粮食收购危机。当时党内领导层围绕粮食收购危机展开了激烈争

论。一派的想法是,粮食收购危机是由压低粮食收购价格所导致的,是人为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结果。而另一派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完全是阶级敌人主要是农村富农的破坏与捣乱所引发的,因此应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从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手中夺取粮食。1927年底1928年初,斯大林不断地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向各级地方党组织发出紧急指示,要求限期完成粮食收购任务。仅在1928年春季,就有3万多名城市工人和党政干部下乡征粮。这些征粮工作队在农村用挨家挨户搜查、设路卡强行拦截售粮农民、关闭市场等办法完成征粮任务。然而这种强制手段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29年4月,收购到的粮食比上年同期还要少,连莫斯科的面包供应都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农民问题的看法有了重大变化,列宁的合作制思想与政策已不再符合他的口味了。斯大林决心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即在农村建立相当强大的集体农庄并消灭富农对商品粮的垄断,以便把粮食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里。

1929年中,每25户农民中只有1户参加集体农庄。到了下半年,斯大林及其助手们提出高速发展集体化的方针,用各种办法催促地方机关加速集体化进程。在斯大林普遍集体化思想的指导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1929年底1930年初出现了暴力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情况。许多州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业,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其后虽然政策有所纠偏,但在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强制与暴力手段实际上一直存在。

按苏联公布的材料,1932年底即“一五”计划结束时,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0%以上;在主要产粮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比例为80%-90%;“新的集体农庄制度建立起来了”。^{[11][617]}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2][325]}

斯大林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目的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建立集体农庄可

以为取得粮食、向农民征收“贡税”提供组织上的保证。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而加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可以为工业化所需资金提供保证。第二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斯大林看来,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社会主义有了牢固的经济基础。1934年,由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苏联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绝对统治力量。社会主义工业已占苏联全部工业的99%。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的谷物播种面积已占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85.5%。第三是消灭作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斯大林为什么把个体农民作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他解释说:“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2][42]}他认为,通过农业集体化把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也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13][337]}第四是形成完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而这正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开展,集体农庄交售的粮食不断增多。1932年集体农庄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占其收获量的1/4多一些,1933-1934年则是1/3强,1935年几乎达到40%。^{[6][63]}斯大林用强制和暴力手段,用高征购的办法使国家控制更多粮食,而悲剧也就由此发生了。未完成交粮任务的农庄领导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枪毙。在庫班地区,16个未完成交粮任务的村镇被迁徙到极北地带。由于高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上交了。农村严重缺粮,造成大量农民死亡。据有关材料,1931-1933年,饿死的农民达300万-500万人。由于不顾客观条件、过于急迫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遭到极大的破坏。如以1928年的农业产值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为94.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1933年为81.5。1933年的畜产品产量只相当于1913年的65%。

1933—1940年粮食年均产量为45.63亿普特,而1913年为47.7亿普特。到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

(三)卫国战争时期的经济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由此开始。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苏联在经济方面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与措施。

第一,改变全国的经济领导体制。苏联于1941年6月30日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它集中了国家的所有权力。全体公民、党、苏维埃、共青团和军事部门的所有机关,都必须绝对履行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与指示。国防委员会拥有全部生产、计划工作的最高领导权,对全国经济实行全面、严格的集中控制。

第二,将生产力快速转移至东部地区。战争初期(1941年11月以前)苏联西部地区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苏联不得不把主要工业企业快速向东部地区转移。在农业方面,苏联迅速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与机器拖拉机站的物资从靠近前线地区运到东部地区,同时还加快收割粮食作物。

第三,加速民转军。为了使整个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国防委员会利用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权,快速将民用生产部门转向军用产品生产。由于快速实行转产,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生产的全部工业产品中,按实物形态划分,65%—68%都是军需物品。

第四,动用大量财政资金保证战争需要。苏联通过财政体系的分配与再分配,把大量国民收入集中在国家预算中。国家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40年的15%急剧上升至1942年的55%。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的直接军费支出为5824亿卢布,占同期国家预算支出总额的50%以上。

第五,对居民消费品实行配给制。战争初期,由于一些重要产粮区被占领,农产品的生产量与收购量均大幅度减少,居民与士兵的粮食及食品供应,主要靠战前建立起来的国家储备来解决。为了缓解供需矛盾,苏联在1941年7—10月基本上改为实行居民凭证供应制度。凭证供应的主要食品有粮食制品、

糖、糖果点心、油脂、肉品和鱼品,非食品类商品有棉织品、麻织品、丝织品、缝纫品、针织品、袜子、皮鞋、胶鞋、肥皂等。战争结束时,由国家统筹供应粮食与其他产品的人数为7680万。

第六,发展农副业。战争期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食品供应严重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放松了对工业企业、机关以及个人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管制,以缓解食品特别是蔬菜与马铃薯等供应不足的状况。

战争给苏联造成巨大灾难:1710座城市和7万多个村庄被完全或部分破坏和烧毁,约2500万人无家可归,31850家工厂及其他工业企业被毁。侵略者破坏了长达6.5万公里的铁路、4100座火车站,炸毁1.3万座桥梁,洗劫并完全破坏了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而最严重的损失是2000万人死亡。^{[14][21]}战争期间,苏联的经济损失达25690亿卢布。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1941年6月—1942年6月),苏联经济十分困难。1942年苏联工业产值仅为1940年的77%,特别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下降,生铁减产72%,钢减产62%,轧材减产66%,煤减产55%,石油减产28%。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1942年7月—1945年5月),苏联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指标不再大幅下降,转而逐步回升。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苏德战场局势不断好转有关。如果以1942年苏联工业产值为100,那么1943年为117,1944年为135,1945年的工业产值仅比战前低8%。战争期间,苏联的机器制造业加速发展。如果以1940年苏联机器制造业产值为100,那么1943年为142,1944年为158,1945年为129。这里要指出的是,机器制造业内部不同部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民用机器与设备产量大幅下降,如1945年纺纱机、织布机的产量仅为1940年的1%。^⑥

农业的恢复状况远不如工业。1943年苏联农业产值仅为战前的37%。1940年的谷物产量为9560万吨,1945年仅为4730万吨。畜牧业的恢复要好于种植业,1945年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卫国战争时期,原本已经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变得更加集中了。

(四)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战结束后,苏联面临的形势是:从国内来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恢复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与复杂;从国际来看,在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后来又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已不再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苏联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全力以赴开展经济恢复工作。这里主要论述苏联“四五”计划与“五五”计划期间即1946-1955年的经济。在此期间,苏联经历了最高领导人的更迭,但主要还是斯大林执政。因此,论述和分析的重点仍是斯大林推行的经济政策。

苏联“四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这个水平。“为此,必须保证首先恢复与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必须使农业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达到有可能超过战前国民收入和人民消费水平的那种高度”。^{[15]11}

为了完成“四五”计划,苏联迅速从战时经济轨道转入和平时期的正常轨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军人复员,吸收退役军人参加生产,对他们进行生产技能培训;将战时疏散到东部地区的居民迁回原住地,为他们创造工作、学习的条件;组织工业企业转产民用产品;加速战争期间德军占领区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农业恢复工作;商业方面由定额配售向敞开的商业销售过渡;广泛培养专家与熟练工作人员;发展科技、文化和艺术;进行币制改革。^{[15]15}

“四五”计划期间,乙类工业(消费资料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15.7%)第一次超过了甲类工业(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12.8%)。这主要是因为战后人民生活急需改善,必须更快地增加消费品的生产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重工业的发展。“四五”计划期间重工业发展迅速,且带有明显的军备竞赛意图,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四五”计划期间苏联用于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71.64亿卢布,其中甲类工业为150.84亿卢布,乙类工业为20.8亿卢布。用于甲类工业的投资占整个工业投资的87.9%。苏联坚持发

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重工业,一些主要的重工业产品产量迅速增长。1950年,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产值比1940年增长115%,在工业总产值增长72%的情况下,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增长了135%。与1940年相比,1950年的生铁产量增加29%,钢产量增加49%,钢材产量增加59%。采煤量在1947年即已超过战前水平。除巴库和乌克兰外,各油田的石油产量也在1950年超过了战前水平。^{[15]63,108,98}

第二,“四五”计划期间,生产资料的生产量增加105%,而消费品的生产量增加23%,分别是1940年的204%和122%。^{[15]63}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虽有提高,但由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远不及重工业,因此市场供应仍然紧张,日用消费品与食品仍然十分短缺。1950年苏联农业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的99.8%。1950年的谷物产量为8120万吨,而1940年为9560万吨。1950年肉和奶的产量分别为1940年的100.8%和84.6%。^⑦

“五五”计划期间,苏联继续贯彻开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生产与人民福利的方针。在此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1%,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2%。计划五年内达到的工业生产总值,只用了四年零四个月就完成了,特别是重工业部门的计划任务超额完成。

“五五”计划也强调要加强农业,但农业发展状况远不及工业。1953年的谷物产量为8250万吨,低于1940年的9561万吨,甚至低于1913年的8600万吨,而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没有大的提高。

二战结束后,苏联仍然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上,这与斯大林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其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有关。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他接着说:“战争快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6]89}斯大林大力推行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使得苏联的农业、农民与农村一直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然而战争结束

后,他不但没有改变农业政策,反而加强了对农民的榨取。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与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使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趋于封闭。斯大林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国家,而苏联又不允许东欧国家进行改革,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生前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因此,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也不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在这一背景下,赫鲁晓夫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最终成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⑧然而,他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①71584}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的苏联经济社会状况时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他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去干活。”“儿童们拎着粗麻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

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①1815}

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更新政策,实行根本性的改革。赫鲁晓夫对此是有深刻理解的,调整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进行经济改革确实是他的本意。尽管他有时表现得反复无常,但一直到他下台前,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推行政策的前提是站稳脚跟,掌握权力。赫鲁晓夫上台后,围绕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生活这一主要目的,在政治领域进行严肃的整顿与清理。他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中,斯大林逝世后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整顿和清理的时期。”^⑨他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清除贝利亚,为在政治领域进行整顿和清理创造前提条件;进行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改组国家安全机构,健全司法制度;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通过一系列斗争,赫鲁晓夫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很快,他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并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一)着力解决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面临的农业问题是十分尖锐的。二战结束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重建与工业恢复。战争期间参加红军的大量农民,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回乡,而是去工厂做工了。此外,苏联在农业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严重弊端,战后也没有及时进行改革。这些因素导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状态。

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作报告,宣布苏联已经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他说:“今年(1952年),谷物的总收获量达80亿普特,而最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总收获量比1940年增加了48%。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⑩作为苏共最高领导层内的农业问题专家,赫鲁晓夫出于各种考虑,特别是在自己地位尚不十分巩固的情况下,并没有对马林科夫关于粮食问题的这一不符合事实的结论进行批驳。但他站稳脚跟之后,就用大量材料揭示了粮食问题这一与苏联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真实情况。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表达了他的看法。信中说:“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而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又不允许我们普遍进行数量充足的谷物产品、特别是优质谷物产品贸易和米粮贸易。由于粮食不宽余,我们只得限制粮食的出口量。”“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1940年共收购粮食22.25亿普特,而1953年只收购18.5亿普特,即减少了3.75亿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普遍发展,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实际工资的提高,国内的粮食消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数量同粮食需求量的增长不相适应。”^⑩1953年的粮食收购量同1948年的粮食收购量大致相等,可是消费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食的必需消费量,使得苏联政府不得不动用1.6亿普特国家储备粮。苏联的“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于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过于迅速”。^{[19]59}

斯大林逝世后,如果再不抓农业,苏联就可能发生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饥荒。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解决农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 推行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

斯大林时期,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过死,如分配给集体农庄的耕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任务有200-250个。这极大束缚了农庄、农场的自主性。因此,赫鲁晓夫执政后,率先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1955年开展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这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二是

改变农业计划制订程序,农庄、农场不再从上级机关领任务,而是自己制订计划。三是改变计算方法,即把按种植作物的公顷数与饲养牲畜的头数计算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计算。

2. 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

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其主要问题在于采购价格低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价格不能反映用于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劳动消耗的实际比价。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它的收购价格仅为3卢布。1952-1953年,生产谷物、牛肉、猪肉和牛奶都是赔本的。生产1公担肉的劳动耗费比1公担谷物大14-15倍,而1952年肉的采购价格仅比谷物价格高5-7倍。此外,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合理,还反映在其与工业品、食品零售价格之间的不协调上。与1940年相比,1950年的工业品与食品零售价格提高了86%,而农产品收购价格则基本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⑪这自然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以上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农庄、农场的物质利益,从而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提高农畜产品收购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与1952年相比,1964年全部农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7.4倍,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15倍,牛奶收购价格提高了3.55倍。

第二,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并逐渐取消义务交售任务。根据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的谷物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第三,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1958年6月,苏联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

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从而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1952-1962年间,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3. 改革个人副业管理制度

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人副业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长期以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在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个人副业生产的农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是:肉为52%,奶为67%,蛋为85%,粮食为3%,马铃薯为72%,蔬菜为48%。农庄庄员家庭收入来源中,个人副业占26%。^{[20]166}

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明确提出,苏联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其中包括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中“每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会后,他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个人副业的措施,主要包括:免除庄员和农场职工的欠款;先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和蔬菜的定额,最后废除针对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度,并取消1953年1月1日以前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私人牲畜的积欠;实行新的农业税法,按固定税率计算税额,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了80%;要求各级领导人协助居民购买牲畜和家禽,保证他们私养牲畜所需的饲料与运输饲料的工具;等等。以上措施,使个人副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与1953年相比,1958年的个人副业农畜产品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马铃薯、蔬菜产量提高14.3%,牛的头数提高25.3%,肉、奶产品产量分别提高33%和27%,水果产量提高46%。^{[20]167-168}1953年时,2000万农户中,有1/4的家庭不养奶牛。到1959年,几乎每家农户都养了奶牛。^{[19]39}应该说,在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在个人副业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当时,有人称之为一种使私人生产受益的“新经济政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

即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允许他们自己决定怎样使用实际上多少是租借来的那四分之一公顷土地。希望得到一小片菜地或果园的要求,很快超出了小镇和城郊工人的范围。大城市的机关被允许在乡村的路边、树林及铁路沿线寻找荒地,作为菜地或果园分给其工作人员,一般为1000平方米。这就是所谓工人集体园地的开端,工人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和工休日来这里劳动。”^{[19]39}

但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并转而对个人副业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政策。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在这一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指出:“党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苏联“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在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从1959年10月1日起,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

由于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采取限制措施,个人副业农畜产品产量明显下降。与1958年相比,1964年个人副业的播种面积、私养牲畜头数、产肉量和产奶量一般都减少了13%-15%。^{[20]168}

4.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斯大林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后,苏联政府却无力向农庄提供它们所需的农业机器。即使有农业机器,这些农庄也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向农庄提供生产技术服务的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斯大林的办法是把有限的农业机器集中起来组建机器拖拉机站,让其为若干个农庄提供技术服务。很快,苏联大规模展开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机器拖拉机站与农庄的关系,绝不限于前者为后者提供生产技术服务,后者向前者支付报酬。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一直起着政治领导作用,党和政府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对农庄进行控制。

到1957年下半年,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制

度,成为苏联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出售给农庄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机器设备,提高农业劳动的质量,同时也简化了经营管理。赫鲁晓夫也认为,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就改变不了充满矛盾的苏联农业制度。195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同年2月26日,苏共中央通过相应的决议;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这些文件对机器拖拉机站的历史作用作出评价,并决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其主要内容是,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的现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并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苏共中央的决议指出,采取这一措施,“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的平均总产量和商品量,并降低其成本”。^{[15][42]}

5. 改革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

自1931年起,苏联集体农庄一直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农庄在年终缴纳所得税、偿还银行贷款、提取公积金和扣除其他必要的支出之后,把收入的剩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基金,按劳动日数和劳动日值,向庄员发放以实物为主的劳动报酬。这一制度有明显缺点。首先,庄员一般要等到一个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获得按劳动日计算的报酬。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因此,庄员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更不知道一个经济年度结束时总共能获得多少收入。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他们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很难定得合理与科学。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用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的基础上,苏联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为单位对

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从1957年起,集体农庄开始逐步改发货币形式的报酬。到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庄员报酬中的比重已提高到62%。^{[15]527}

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促进农庄庄员关心劳动成果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它并没有根本解决庄员劳动报酬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6. 推行垦荒

赫鲁晓夫决心搞垦荒,其基本思想或主要出发点是:第一,在实行农业计划体制改革与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苏联农业发展状况有所改善,而要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和畜产品产量,就必须走捷径,这个捷径就是垦荒。第二,垦荒投资效益高,回收期短。赫鲁晓夫的结论是:“用于开垦新土地的基本投资,实际上一年之内就能收回”。^{[22]819}第三,赫鲁晓夫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通过集约化耕作来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增加粮食产量。当时,莫洛托夫等人提出苏联应当集中精力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效率,极力主张集约耕作,反对粗放耕作。赫鲁晓夫反驳说,集约耕作意味着为将来而发展苏联农业,但苏联今天就需要面包,而不是明天。他接着指出:“原则上,我赞成农业的集约发展,但是这需要非常先进的农业劳动力和巨大的物质资源。这两者我们都没有。”^⑩

赫鲁晓夫排除各种阻力,全力以赴地推行他的垦荒计划。1954年春夏两季,这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一年开垦了1900万公顷,1955年又开垦了1400万公顷,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1954年获得好收成,全国粮食产量增加1000万吨,但其中大部分是老农业区增产的,新开垦区只收获了300万吨,这是因为垦荒工作才刚刚开始。1955年遭遇干旱,新开垦区的春小麦全枯死了。到了冬天,粮食与其他食品供应十分困难,导致成千上万人来到新垦区定居的人们纷纷离去。这让赫鲁晓夫面临艰难处境。莫洛托夫等人借此指责他的垦荒政策是飞跃式的鲁

莽的冒险。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动摇,反而进一步扩大垦荒面积。^{[19]62-63}1956年是关键的一年,如果再次出现1955年的情况,赫鲁晓夫的执政地位将会动摇。但这一年,因气候好和垦荒区肥力充足,苏联农业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25亿吨,其中垦荒区的产量为6300万吨,占总产量的51%。国家收购的粮食为5410万吨,其中从垦荒区收购了3680万吨,占总收购量的68%。这样,垦荒政策的批评者暂时失去了批评的理由。1957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对其在垦荒工作中的功绩予以表彰。

自推行大规模垦荒后,苏联农业收成依然不稳定,有丰收年也有歉收年。关于如何从总体上评价垦荒,争论焦点是:把物力、财力用来提高原有耕地的肥力和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是不是比把它们用于垦荒更好?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正如前面谈到的,当时苏联没有条件搞集约化农业生产,即不可能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第二,实际情况表明,垦荒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1954-1960年,苏联垦荒面积达到4180万公顷,播种面积扩大29%,谷物播种面积扩大67%。1954-1959年,苏联用于垦荒的投资总额为440亿卢布,而同一时期垦荒区生产的商品产品使国家预算进款760亿卢布。国家从垦荒区净得320亿卢布,这还不包括垦荒区新增加的生产基金(约350亿卢布)和建造的大量住房在内。1953-1958年,苏联农业产值提高了50%以上,年均谷物产量超过1亿吨,比此前6年增加了39%以上。1958年,农庄庄员的平均劳动报酬比1953年增加82%。^{[23]289-290}垦荒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持生态平衡的措施,单一产品的连续耕作,使新开垦的土地上长期积蓄的养分很快被消耗殆尽。赫鲁晓夫没有接受在垦荒地上留出18%休闲地的建议,并对提这个建议的人说:“只有蠢货才会要休闲地!”一个研究所所长因为留了25%的休闲地竟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24]111}这种违背科学、单凭主观意志的做法,造成大量土地遭到风沙侵蚀。从1955年到1960年,已有

几十万公顷土地被风沙侵蚀,但并未引起注意。然而1962年夏季大旱,风化侵蚀波及了几百万公顷土地,“仅在巴夫洛达州一地,就有150万公顷土地被风‘刮走了’”。^{[19]116}由此,苏联农业生产也就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

7. 扩种玉米

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提出应提升玉米在畜牧业饲料中的比例。他认为,苏联今后必须更多地种植玉米,它是有价值的饲料作物,许多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都广泛利用玉米来作饲料。1955年5月,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一次讲话中强调:“在目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增产玉米是发展农业的根本问题之一。不增产玉米,要保证急剧增加肉类、牛奶的产量,那是不可思议的。”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时,看到了生长良好的玉米和用玉米喂养的长得膘肥体壮的牛群。这使他下决心进一步推动玉米扩种工作。1960年,玉米播种面积达到2800万公顷,1962年又扩大到3700万公顷。

应该说,赫鲁晓夫力图通过扩种玉米来提高谷物产量和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思路,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他不顾具体条件,违背因地制宜这个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原则,通过运用政治压力搞运动的办法,让那些根本不适合种玉米的地区去种植这一作物。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对种植玉米不积极的地方领导人提出批评:“在那些没有长出玉米的地方,存在着不能促使它生长的‘因素’,这一‘因素’应当在领导干部中寻找……应当撤换那些本身使玉米这种作物干旱枯萎、但却没有为它恢复生机提供机会的领导者。”^[25]强制推行扩种玉米运动的不良后果有:一是由于玉米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据1958-1962年的统计,种植和收获100饲养单位的多年生饲料,如三叶草、梯牧草、牧场草等,成本为1至3卢布,而种植和收获100饲养单位的玉米的成本是5至6卢布。^{[19]120}二是由于扩大了玉米播种面积,冬小麦的播种面积下降,影响了谷物增产。赫鲁晓夫在1955年提出的在1960年之前每年谷物总产量至少要达到1.65亿吨的指标根本没有达到,到1960年

仅为1.255亿吨。三是在一些特别不适合种玉米的地区,青饲料供应大大减少。在立陶宛,1960年为每头奶牛购买的青饲料量为6吨,1961年降为4.5吨,1962年不到1吨。^{[19][20]}

后来,赫鲁晓夫对不顾条件扩大玉米播种面积的错误也有所认识,承认玉米并不适合在所有地区种植。但他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同时,亦常常把责任推给别人。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开始为种植玉米开展宣传运动时,我真诚地相信——并且我仍然相信——这是做得对的。但有些干部想迎合我。说得粗一点,他们好像一群马屁精。他们不首先为农民作好适当的准备,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结果,农民根本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种植和收割玉米。最后,人们对玉米可以作为青贮饲料作物产生怀疑,而我作为第一个推广种植玉米的倡议人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⑥

8. 推行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的政策

在195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与1954年相比1960年全国主要畜产品产量的增加幅度。其中,肉类和各种油脂、奶品要增加100%,蛋类要增加120%,各种羊毛要增加80%。^{[25][28]}可见,这一目标定得相当高。然而,赫鲁晓夫在垦荒和扩种玉米方面一开始所取得的成绩影响下,已不满足于上述主要畜产品产量的增加幅度了。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惊人的计划:要在三四年内(即到1960或1961年)在按人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超过美国。1957年按人均计算的主要畜产品产量情况如下:苏联肉类产量为32.3公斤,美国肉类产量为102.3公斤;苏联牛奶产量为245公斤,美国牛奶产量为343公斤;苏联黄油产量为2.8公斤,美国黄油产量为3.8公斤。^{[26][32]}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1955-1957年,苏联肉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不到10%。如果按这个已经不算低的速度来计算,要使苏联人均肉类产量赶上美国1957年的水平,约需要15年。赶超计划的执行结果是,苏联人均肉类产量到1964年提高到40公斤,而美国1961年的人均肉类产量为100公斤。可见,赫鲁晓夫在1957年提出

的在三四年内赶超美国的计划是多么不现实。

赫鲁晓夫提出赶超政策,成为反对派计划在1957年把他赶下第一书记位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事先并没有与党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商量,在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的情况下提出了冒险计划。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大失误。

(二)力图通过大改组推动工业加速发展

赫鲁晓夫在大力调整农业政策、实行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的同时,也着手探索调整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

赫鲁晓夫曾长期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作,熟知斯大林时期那套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看到了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及部门管理原则的严重弊端。所以,他一上台,就集中力量处理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的问题。此外,当时苏联计划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按人均计算的产品产量赶超美国的任务。但苏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任务是很难的。而赫鲁晓夫把赌注押在了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上。1957年3月8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一旦实现二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一旦发挥出自己的组织力量,工业就将突飞猛进,工业方面的成就不会小于我们在农业方面由于开垦荒地而取得的成就……改组工作,将在我国工业中开拓出真正的生荒地。”^⑦赫鲁晓夫认为,如果不对工业与建筑业进行大改组,就不可能调动各加盟共和国与企业的积极性,也就难以使整个工业加快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赶超战略确定的目标。

赫鲁晓夫对工业与建筑业的调整和改革大体上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1957年之前的局部性调整;第二步是1957年的大改组。1957年之前的局部性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权限和企业经理在生产与经营管理方面的独立性和机动性。应该说,在工业部门推行的这些局部性调整,对调动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1956年苏联的经济形势是令人振奋的,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1%,谷物总收获量比上年增加了20%。可以说,1956年是令

赫鲁晓夫十分得意的一年。在此基础上,他决心对工业与建筑业进行大改组。

这次大改组的主要内容是,针对部门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变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将“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以便把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通过大改组要达到的目的是,在消除因部门管理原则而产生的管理过分集中等问题和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的同时,使国家的集中领导与地方经济机关、党的机关和工会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使全国(联盟、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经济协调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改组目标,苏联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第一,撤销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第二,在全国建立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经济行政区建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受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双重领导。第三,改变部的工作性质和职能。改组后保留的一些部,其主要任务是制订本部门的发展计划并保证生产技术水平,编制科研和设计工作计划并监督执行。这些部的职能是通过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实现的,它们不再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第四,改组中央经济管理机构。根据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的要求,苏联决定撤销原来负责短期计划的国家计委,把原来作为部长会议职能机构的国家经济长期规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计委,负责全国长短期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在改善计划工作方面,从1959年起,苏联不再实行制订和批准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办法,而是分别按年度、部门、加盟共和国、各经济区企业和建筑机构编制长期规划。另外,苏联还大大减少了计划指标。1958年的计划指标比1956年减少了一半,1959年确定的“七年计划”^⑧的控制数字比1958年又减少2/3。^{[27]275-276}

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大改组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克服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病,克服部门本位主义,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提高其积极性与主动性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大改组很快取得了效果,具体表现在:1959年,按经济行政区成立的

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的72%,地方管辖的工业占22%,而中央管辖的工业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到6%。联盟预算与加盟共和国预算以及地方预算的关系也有了大的变化。1955年联盟预算占全国预算支出的73%,到1960年降至41.2%。同期,加盟共和国预算和地方预算分别从12.5%和14.5%提高到39.1%和19.7%。^{[28]637}大改组在促进各地区经济综合发展和同一个地区内不同部门之间协调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旨在克服部门本位主义的大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部门的条条分割状态,使很多跨部门的综合性重要问题较容易获得解决。另外还应看到,由于实行了地区管理原则,在一个经济区范围内政府可以较合理地组织产销关系,互通有无,充分利用本地区物资,从而节约了运费、降低了成本。

但是,这次大改组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从提高经济综合效益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突出的问题有:

第一,在克服部门本位主义的同时,导致以地区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泛滥,部门“割据”被消除的同时又导致了地方“割据”。

第二,地区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泛滥,必然影响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经济混乱。

第三,搞乱了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影响了统一技术政策的有效执行。大改组后,绝大部分的企业和科研组织被下放到了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这“开始使它们仅仅适合于地方的需要,忘记了全国统一的技术政策,忘记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⑨

第四,管理机构重叠,比原来更加臃肿。大改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精简机构和提高工作效率,但实际结果是,工业和建筑业中的管理机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到1963年,管理机构的数量比大改组前几乎提高了3倍。机构重叠、平行和责任分散等问题,导致一方面短缺产品更多了,另一方面仓库里却堆满了卖不出去过时产品。

对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苏联自己的评价

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而“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批评1957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③

(三)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1964年10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农业和工业领域采取的政策，并没有真正改善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他执政后期，苏联经济呈恶化趋势并出现了混乱局面。

第一，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不断下降。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在1951-1955年为10.8%，1956-1960年为9.1%，1961-1965年为6.5%；同期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1%、10.4%和8.6%。^{[28][30,126]}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从1956年到1963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速降低了一半，国民收入年均增速降低了2/3。

第二，一些重要的质量指标不断恶化。在“七年计划”的4年中，整个国民经济中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降低了9%，而农业中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甚至降低了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数年内，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下降到5.6%，其中1962年为5.5%，1963年为5.2%。工业中“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到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达到了创纪录的程度。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5%高出1倍。

第三，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照“七年计划”，1959-1963年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速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速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农产品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牲畜被屠宰，结果是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1964年，苏联各地出现了肉类产品长时间脱销的情况。而在前一年即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

应都出现了问题。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最后，苏联动用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同时还动用了国防储备粮，才避免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

赫鲁晓夫本想通过农业改革激发农业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关心，然而这一目的并未实现。1958年，集体农庄单人每日劳动报酬(货币和实物)合计为1.56卢布，到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5年共增加33戈比，即每年才增加不到7戈比。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经济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在上面提到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苏斯洛夫在发言中指出：赫鲁晓夫所犯的严重错误是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又不善于正确地运用这一权力。这样就造成以下情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家与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露其独裁政治造成的严重弊端上，但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了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特质为什么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再现了呢？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对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

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被触动的前提下，在党内缺乏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最终背离了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②对此，亚·尼·雅科夫列夫的评价是：“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③

总之，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已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 and 个人的声望，原因是他奉行的是虎头蛇

尾的、半途而废的政策……因此，在关键时刻到来时，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几乎引起了所有人的忿怒。”^④

同时，我们亦应历史地与客观地指出，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他在对斯大林时期过度集中的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政策调整与改革，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注释：

①日本著名苏联经济问题专家佐藤经明教授也认为苏联的工业化是从1928年开始的。参见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②斯大林的第一种说法是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工业化运动或工业化时期就结束了。1933年1月7日，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了题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报告指出：“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但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飞跃”时，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页。

③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7—208页。

④参见《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4、5期。

⑤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

⑥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342—343页。

⑦参见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⑧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到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的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工作。

⑨参见《苏》《共产党人》杂志，1961年第7期。

⑩转引自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140页。

⑪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40页。

⑫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产品收购价格严重扭曲,相关情况可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522页。

⑬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51页。

⑭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67页。

⑮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10月17-31日)》第1卷,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80页。

⑯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72页。

⑰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83页。

⑱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这一时期,要解决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根据这一精神,大会修改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两年的任务,并通过了“七年计划”(1959-1965年)。

⑲参见[苏]《真理报》1957年4月29日。

⑳参见[苏]《真理报》1964年11月8日。

㉑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㉒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参考文献:

- [1]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2]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赫鲁晓夫言论:第9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 [4]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5][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 [6][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M].赵洵,林英,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7][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 [10]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3卷[M].山东大学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12]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4][苏]B.T.琼图洛夫,等,编.苏联经济史[M].郑彪,等,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15]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16][南斯拉夫]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M].赵洵,林英,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17][苏]尤·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M].王复士,赵玉龄,等,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18][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19][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M].邹子婴,宋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20]陆南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农村私人经济政策[M]//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1981.

[2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22]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23]金辉,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M].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24]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年3月24-26日)[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25]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26]赫鲁晓夫言论:第6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27]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28]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29][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